

得明显进步,多数产业的核心技术并不为我国企业所掌握。这就造成了“规模扩张迅速+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的矛盾状况,最终导致了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的问題,而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便是相关政策刺激。

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如技术创新,政府持续出台刺激政策,产生了各种扭曲效应,最为突出的政策就是对研发投入进行补贴,这一政策本意在于通过不断加大对企业研发补贴,引导企业将研发资源投入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激烈措施往往难以达到本意,甚至会产生企业通过作假等方式骗取补贴的行为^[1]。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决定是建立在多重因素的权衡基础之上的,在技术创新选择不是理性选择的时候,过度的刺激政策并不一定能改变企业的决定,反而会诱发企业的套取政策优惠的行为。

2.宏观调控方面,经济调控对于经济运行干预力度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

当经济发展面临外部威胁或者微观经济主体投资等行为出现下降趋势,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时候,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政府都倾向于采取财政、货币等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过于频繁、力度过大地干预经济运行,实质上是破坏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不利。

一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影响了依靠市场规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例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普惠性”地对企业经营予以扶持,其结果是导致一些本该被淘汰出局的企业生存下来。而产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这一市场规律缓慢得以实现的。

二是对国家调控,过分依赖于投资,加大了经济发展的许多矛盾。加大公共投资,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其不利方面就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对于投资过分倚重,而本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消费则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快速下降的局面。整体来看,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有所缓解,但是还没得到完全解决。

(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职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缺陷,对于一些领域本身无能为力,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在这些领域,本应

由政府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调控管理。但是在经济实践中,我国在很多领域同时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造成政府和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势均发挥不出来。

1.政府在市场机制无法起作用的环节管理机制失位,影响了正常的竞争秩序

一方面,对于许多本该由政府管辖的领域,如行业发展标准、特殊产品标准制定,及相关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都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例如,目前引人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就与缺乏详细行业标准及法规执行力不足有关。在客观上,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对于由于市场机制所产生的市场垄断状况,市场机制本身对其无能为力,需要政府立法和管理。但是,我国对垄断方面,缺乏一部内容详细、可操作性强的反垄断法规。在客观上,不能保护小企业免受垄断企业的非法侵害,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侵害。

2.政府在本应由政府管理且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支持作用的领域缺位,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2]。但是,目前在很多政府职能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领域,存在严重的政府缺位。例如,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在公共卫生、养老等领域,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另外,对于部分领域,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合作,才能真正推动,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缺位,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当前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工匠精神的缺乏,而事实上,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简单依靠政府或者市场都很难真正解决,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一方面需要将工匠精神深深嵌入企业文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建立适应工匠精神的社会文化^[3]。

二 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如何发挥好政府的职能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有些事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有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

承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在学术界其实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体制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有效调整,即使短期内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在长期内,这些问题也会得到彻底解决或者部分解决。相比而言,政府调控对整个经济运行,只会起到干扰作用,从长久来说,得不偿失。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调控也无能为力。这种观点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政府调控不但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还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调控将有利于我国的快速发展,完全没必要对政府调控过大过分担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的位置能否摆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环节和领域交还给市场,而需要由政府负责的职能则必须做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从如下方面做好:

(一)以简政放权为突破,政府逐步退出对微观领域的过度干预

简政放权,其实质是政府向社会、向企业放权,主要体现在减少行政审批,从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为企业恢复活力创造空间。^[4]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就强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而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对简政放权继续提出了新要求,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继续完善简政放权,使其更到位。实际上,自从十八大以来,政府一直在简政放权方面下足力气,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方面的相关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减少了企业及其它组织和个人的负担。但是简政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身的“革命”,在现实中面临很大阻力,必须采取广泛措施保证效果。一方面必须提高相关措施的“含金量”,逐步提高简政放权的力度,切实将那些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较大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到其中,防止各级政府避实就轻。另一方面,简政放权绝对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从以前的事前控制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的监控,其管理的责任非但没有减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加重了。

(二)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

要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必须强化其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两步走”战略中,分别提到了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政府职能的优化。在这方面,本文认为,如下几个问题最为突出:

一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等,均可看作是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就可以减轻这一损失,加速经济发展进程。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强化政府的相关职能,必须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绝对不能将这些活动成为干涉经济正常运行的借口。

二是强化市场监管职能。在完善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不断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竞争有序、公平。一方面,对那些关系人民群众核心利益的重点行业和那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行业,进行重点监管。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问题,在现实中问题层出不穷,必须要持续加强监管。房地产行业不但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还关系到国家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其发展也必须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对于突出的共性问题,必须要采取全方位的措施予以解决。例如,社会信用缺失是目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此问题具有复杂的内外部原因,很难通过单一的方式在短期内解决,建议可以在加强政府监管基础上,结合其他方式,创造一个“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者”的社会氛围,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三是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公共服务功能职能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与福利、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整体来看,政府在有些方面做得较好,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等。有些方面则比较薄弱,如社会保障与福利等。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职能强化方向有两个:第一是服务广度扩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之中,享受各类公共服务的人员数量也处于快速攀升过程中。第二是服务深度延伸。即人民群众对各项服务的质量要求提高了,

且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人民要求服务提升的快速提升。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承担的重要职能,该职能发挥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经济运行的效率。只有发挥好此职能,才能为市场体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 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在十九大报告中,则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产权激励有效、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敏、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整体来看,这两个提法在内在具有高度一致性,十九大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更为具体。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市场体系还尚未完善,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来着手:

(一)消除各种不同形式的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市场

虽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已经20多年,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型并逐步走向成熟,但是不可否认,在很多地方,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的地方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等,导致全国各个市场处于程度各异的分裂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市场还未完全形成^[5]。只有克服这一情况,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证整体的消费者福利。

(二)促进要素市场改革,促进要素市场的发展

我国在要素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体现为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要素市场的改革,也将成为整个市场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首先,由于户籍政策等政策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资源流动偏离了应有局面,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受到影响。在要素完全流动不存在障碍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将在最大限度内保证合适数量的劳动力向劳动力需求区域转移。但是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导致一些本该可以转移的人口选择了向其他地区(如户籍政策不严格或者其他条件较为优厚者)转移或者拒绝转移,这就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发生扭曲。最近几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智能机器人的销量保持高速增长,背后所隐藏的因素,除了新技术所带来的更高效率使企业更愿意采纳外,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前几年所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趋势,在我国劳动力整体数量已经濒临顶峰进而会出现下降的前提下,这一问题必

须通过多采纳智能制造的方式代替劳动力。但是,有许多工作是机器人在现阶段所无法胜任的,尤其是诸多服务行业,要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力无障碍流动,将是一个有利的选择。

其次,在资金来源上,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异。以银行贷款为例,由于银行体制、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在同等情况下,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获取贷款则相当困难。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由于大企业资金实力强,可供抵押的资本多,获取贷款较为容易,而相对而言更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获取贷款则困难。如果考虑到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更容易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获取资金,这种不平衡性更大。

整体来说,要素市场的改革,必须要以促进要素的有效流动以及不同经济体在获取要素方面的公平性为目标,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逐步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效率。

(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的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要注重保值增值,还要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切实提升其运营效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趋势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大趋势,而混合所有制具有能够以更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资源、融合不同所有制的优点、提升企业自我发展意识、构建企业联合体增进产业链竞争力等潜在优势^[6],如果不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能实现国有资本公益性和企业性的合理融合与并进发展,真正实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曾宪奎.我国技术创新的粗放化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31-37.
- [2] 乔惠波.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前线,2013(8):42-43.
- [3] 曾宪奎.工匠精神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17(8):97-101.
- [4] 朱之鑫.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J].求是,2013(22):34-37.

- [5] 韩俊,任兴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N].人民日报,2013-11-20(7).
- [6] 曾宪奎.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J].红旗文稿,2015(24):19-21.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Under the New Era

ZENG Xian-ku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ntering a new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especial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vacancy and the inadequate functioning of market mechanism.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t must reject the influence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constantly push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ctively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establish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mainly including measures to eliminate market barriers, speed up the reform of factor market and upho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Key words: the new era;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public ownership

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思想资源探析

王建刚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 任何一种先进理论的形成都是有其思想资源的,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同样如此。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分析,以及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理论进路的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等在历史观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历史观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马克思; 黑格尔; 费尔巴哈;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6-0037-08

任何一种先进理论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有其产生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同样如此,也有其自身的思想资源。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等在历史观方面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 黑格尔的历史观: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最直接思想资源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其在历史观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撰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哲学》一书,该书针对历史观问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甚至是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黑格尔对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影响了马克思对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最初是攻读法律专业的,他想通过对法律的研究进行哲学思考,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以求解决德国出现的种种社会生活问题。但当他为这一法的哲学撰写形而上学的导

言时,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使其无法克服。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启发了他,但是他们的思想是抽象的体系,就像几何一样,由公理到结论,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困惑。黑格尔哲学当时在柏林占据着统治地位,他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结合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世界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来进行研究。面对这种哲学所凸显出来的极大吸引力,马克思开始放弃其原先的浪漫唯心主义,在爱德华·甘斯的引导下,逐渐转向信仰黑格尔哲学,以求利用黑格尔哲学来解决其所遇到的精神危机。

但是,从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撰写《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发表的相关政论性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观思想,是随着其对社会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发生变化的,他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思想的合理成分,但是又背离和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观思想,不断向新的历史观靠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逐渐转向一种新的历史观。因此,从马克思的哲学创作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既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是同它脱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在客观上反映了黑格尔的历史

[收稿日期] 2017-08-19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历史观研究”资助(编号:2018-ZZJH-066)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79-),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观是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最直接思想资源。

其次,黑格尔将辩证法运用于对历史的认识,直接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49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是辩证法的历史,只有将辩证法运用于对历史的认识,才能够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理论体系。

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果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述了辩证法的思想。他把辩证法引伸到历史领域,提出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规律的过程。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2]244}这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辩证发展的这一“合理内核”。它是马克思科学历史观形成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辩证法,他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认为它们才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道德观点的最终决定者。显然,这种历史辩证法淡化和磨灭了历史中的物质因素,使思辨范畴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受到弱化。因为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其创造过程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性条件。所以,只有遵循一定的物质条件,客观揭示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才能够彰显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

马克思在将辩证法运用于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中,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足,他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可见,马克思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体,将思维或观念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的主体,内在地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

法,使其辩证法在思辨形式中获得了丰富的现实性和物质性。正是在批判和借鉴黑格尔将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才逐渐实现了对历史本质的科学认识。因此,黑格尔将辩证法运用于对历史认识的思想,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意义重大。

最后,黑格尔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料。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都作过较为详尽的说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多次称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4]160}。这些天才思想,特别是历史辩证法思想,均成为马克思创立新的历史观的重要思想资料。比如:黑格尔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必然性的思想,就被恩格斯称为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的“革命方面”,由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并成为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就有和黑格尔的同样论断,即:“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5]黑格尔提出了要探索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思想,即所谓“动力的动力”思想。黑格尔本人虽然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但恩格斯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他划时代的功绩在于提出这个任务,并为马克思所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的所谓“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陋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茫茫云雾中”^{[4]30}的观点,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论断,从而科学地解决了黑格尔提出的“动力的动力”问题。

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黑格尔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来源,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来源并不等于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黑格尔历史观的直接简单扩展,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从本质上来讲是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内在原则的区别。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历史观的合理成分,以及对资本主义客观现实进行辩证分析后创立的。

二 费尔巴哈的历史观: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历史观研究方面,与黑格尔相比,尽管费尔巴

哈显得非常贫乏,但是他在研究历史观过程中所取得的合理思想,却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通过对费尔巴哈相关论著的系统探究,不难发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理论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费尔巴哈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毋庸置疑,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和创立是离不开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就是唯物主义。因此,只有将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才能够重新扶正被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科学概括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马克思历史观创立这一唯物主义基础,正是由费尔巴哈提供的。

费尔巴哈是最早打破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哲学王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但是,其所倡导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不能够对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历史辩证法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吸收。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一样,在本体论仍然是从抽象性上谈论世界的本质,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实体,即自然和人。但是,他所谈论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而是抽象的自然界。他所谈论的人也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于自然界中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他认为:“现实的人类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6]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言,费尔巴哈“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2]226}。

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足,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首先指出费尔巴哈建立在抽象自然观基础上的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唯物主义严重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是站立在自然之外的自然。然后,对费尔巴哈这种抽象的自然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7]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界,是一种“人化自然”。最后,马克思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区分了他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间的本

质差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

正是在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扶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历史辩证法,把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的历史观。因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建立实践唯物主义,创立科学的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针对历史观问题,费尔巴哈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比如他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引入到历史观的研究之中,并使其成为历史观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和人是客观的存在,是有其独立本质的,“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9]。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够透视其本质。此外,在涉及到探讨和考察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等问题时,费尔巴哈也实现了唯心主义不能容忍的跳跃,提出了许多具有发展能力萌芽的观点,这些观点从各个层面都显露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和胚芽,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费尔巴哈历史观的直接延续,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来看,马克思的历史观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无论是在历史的出发点,还是在历史的发展动因,以及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的角度出发来探究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从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生产活动出发来探究历史的发展,显然是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超越。

三 其他思想家的历史观: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一般理论资源

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除了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历史观理论直接影响之外,还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历史观的影响,这些思想家的历史

观尽管从本质上讲均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他们的探讨在某些方面已经涉及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启发。

(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尽管它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是经济问题,但是它却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或者说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观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是从所谓“人类的本性”出发,来说明经济生活并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它是人所具有的天性,这种观点以亚当·斯密最为代表。亚当·斯密在其重要著作《国富论》中,系统阐释了“人类的利己本性”问题。在他看来,人生活在社会中,与动物不同,因为人们之间有协同动作、互相交易、互相援助的必要。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的帮助;而给予援助的人本身为了利己的目的,同样也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这种援助。因此,只有唤起别人的利己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因为只有唤起别人的利己心才能实现自己的利己目的,所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看,自己越是充分利己,就越对别人、社会有利。正是由于利己的本质导致了利他的结果,亚当·斯密由此得出利己就是利他,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人们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0]。

在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以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又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对立的根源。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魁奈在其著作《经济表》中,最早明确提出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思想。他在叙述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流通和再生产时,把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生产阶级是指耕种土地,逐年再生产国民财富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君主土地所有者及什一税的征收者;不生产阶级是指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的阶级,他们的劳动不产生财富。但是,魁奈还没有掌握科学的阶级划分标准,不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使用情况来划分社会成员的不同

阶级。他的这种划分既不能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更不能正确反映这种生产关系中人和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是进一步混淆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界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在阶级划分上超越了魁奈,他们比较全面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全部年产物主要分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个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11]。李嘉图 and 斯密一样,也把资本主义社会明确划分为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此外,斯密和李嘉图还以劳动价值论为武器,系统探讨了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三大阶级之间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私有制。

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人本性自私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出发点的理论和三大阶级划分理论,马克思给予了积极的批判。

第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人本性自私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出发点理论的批判。马克思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实践观出发,科学地界定了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1]501}。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劳动本性,人的社会性。随后,马克思在这种科学人本观的指导下,对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人本性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人本性观,从人的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来探讨和说明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不懂得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性因素不是利益,而是人们的物质劳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利益也是由人的物质劳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同时,人们的利益也是多样化的,仅仅把利益单纯地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也是错误的。

第二,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三大阶级划分理论的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物质财富的分配领域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马克思认为,这种阶级划分标准是不科学的。因为对阶级的划分不应该